政治科學論叢／第 63 期／民國 104 年 3 月／頁 129-164

超越無政府狀態：
先秦秩序取向政治思潮對國際關係典範的啓示*

陳欣之**

摘　要

美歐起源的現代國際關係主流典範，認爲國際體系爲無政府結構，受到結構的束縛，行爲者只能適應無政府狀態，在結構內苟且求生。相對之下，華夏文明先秦時代政治思想，鼓勵國家追求王霸地位與重建層級秩序。

本文擬超脫美歐國際關係主流典範有關無政府狀態的已有看法，以華夏文明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論述暨具體實踐爲範本，檢視先秦時代秩序取向的政治思想內容，以圖理解先秦國際體系行爲者競逐國際主宰地位的源由。本文發現，主要先秦政治思想認爲，自然狀態結構會促使行爲者追求層級秩序，以解決內部與外部失序的混亂局面。國家會追求國際環境的權力優勢主宰地位，營建以主宰國家爲核心的普遍性天下秩序。

關鍵詞：無政府狀態、層級、主宰地位、國際體系、先秦

---

* DOI:10.6166/TJPS.63(129-164)。本文爲科技部研究計畫（MOST 103-2410-H-006-022-MY3）之部份成果。本文原始版本曾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3 年會暨第 6 屆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論文評論人吳玉山教授的指點，以及兩位匿名期刊審查人的針砭建議。本文之疏失由作者自行承擔。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E-mail: paristor@mail.ncku.edu.tw。

收稿日期：103 年 11 月 25 日；通過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夏文明體系綿延久長，[1] 春秋戰國時代的國際權威分合離聚與物質權力的流散集中，[2] 勾繪出國家互動模式的變化，以及國際體系的多樣變化，成爲吾人理解國際關係結構變化的豐富樣本。同一時期的諸子百家論述，更構成華夏文明政治思潮的源由（蕭公權，1982：3）。由此出發，檢視華夏文化先秦春秋戰國時代建立霸業一統帝國的實踐，爬梳同一時期的政治思維，勾勒國家掙扎脫離無政府亂世的面貌，無疑是創新國際關係典範論述的重要起點。

本文擬超脫現代美歐國際關係主流典範有關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已有看法，以華夏文明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論述暨具體實踐爲範本，檢視先秦時代秩序取向的政治思想內容，以圖理解先秦國際體系行爲者競逐國際主宰地位的源由，並借鏡先秦時代政治思想元素，開拓國際關係理論的新方向。

壹、適應無政府狀態的美歐國關典範

國際關係學術討論中獨佔鰲頭的美歐主流國際關係典範，採用霍布斯

1　華夏一詞起源於西周時期。周王國內各封國，自稱爲「夏」或「諸夏」，更爲表彰自己的文化，以「華夏」一詞自稱，區隔文化較爲落後的蠻狄戎夷（邢義田，1987：20-21；許倬雲，1984：310-311）。「中華」一詞起源自晉代，取代「華夏」，作爲區隔中原漢族與入侵外族的稱謂（張雙志，2006：60）。進入近代，中國被賦予主權國家的意涵，「中國」一詞已非戰國時代的本義，至少有歷史、文化與政治維度的不同思考與意涵（葛兆光，2014：31）。「天下」與「中國」一詞發展於西周至春秋戰國。到戰國時代，「中國」一詞至少有七種意涵，它或是指諸夏集團，或是指中原地區，或是意謂九州，或是等於三晉，或是帝王之都的同義字，或是指國境之中，或是指中等之國（張其賢，2009：233）；「天下」在戰國時代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是中國；廣義的天下是中國加上四夷；其中廣義天下雖然是一個包容性的概念，狹義天下卻是一個區隔性的概念（張其賢，2009：241）。有別於近代對天下一詞的文化理解，天下在戰國時代亦具有政治地理的概念（張其賢，2009：241）。爲求眞實反映時代涵意，本文以華夏一詞指涉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地域與文化共同體。以中華一詞指稱爾後的中原民族融合體，以華人指稱不涉及政治國家概念的人種。

2　本文所稱先秦時代包含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春秋依據《左傳》的記載年代，由西元前 722 年至西元前 468 年止；戰國時代自西元前 468 年至秦國統一天下的西元前 221 年止（楊寬，2002：7）；合計先秦時代所跨越的春秋戰國時代共有 50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omas Hobbes）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論說爲範本（Williams, 2011: 147），假設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乃處於無政府狀態，位居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中的國家，只能被動地受無政府結構驅策，或是追尋權力以求自保（Waltz, 1979；Mearsheimer, 2001）；或者尋求合作的契機，以滿足國家利益（Keohane, 1984）；或者國家透過互動實踐，營造不同型式的無政府樣態（Wendt, 1999）。整體而言。美歐主流的國際關係典範，多集中討論無政府狀態對國家行爲所形成的作用，以及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可能互動。結構現實主義者（Structural Realists）尤其認定國家難以扭轉無政府結構，至於國家各種行爲樣貌，只不過反映國家在無政府結構中的調適。以美歐歷史經驗爲論述核心的現代國關主流典範，除溫特（Alexander Wendt）主張，不同種類的無政府樣態將無可避免地轉換爲世界國（world state）外（Wendt, 2003），各家雖在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或是方法論（methodology）上有所差異，大多仍是國家調適於國際無政府結構的觀點。

一、自然狀態與國家

將個人間的自然狀態，有限地類比延用至國家間關係，是美歐主要國際關係典範的共同理論基礎（Lake, 2007: 47）。霍布斯認爲，受到競爭、猜疑與榮譽的人性驅動，人群在沒有成立國家之前，因爲沒有公認之權力以壓服一切，於是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乃處於相互爲敵的永久戰爭狀態（state of war）（Hobbes, 1991: 88）。不過霍布斯認爲，依靠感情與理智，自然人會逐漸脫離無政府狀態，建立國家（Hobbes, 1991: 90），形成擁有無上權力與能力之利維坦（Leviathan）人造機制，以保障自然人之生命安全，抵禦外侮（Hobbes, 1991: 121）。洛克（John Locke）則認爲自然狀態與戰爭狀態完全不同；自然狀態乃是自然人互不從屬與不存在最高權威，理性且平等地生活，各自然人均享有執行自然法之權力，包含剝奪違反自然法之犯罪者生命的暴力懲處作爲，與受到損害時得要求賠償的權利（Locke, 1991: 270-274）。當自然人企圖將另一人置於其絕對權力下，或是對另一人之自由、生存與財產懷有敵意，無論有無可訴請救助的共同裁判權威，兩者之間乃構成戰爭狀態；戰爭狀態只有在停止使用此種不法武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者是侵犯者提出和平建議進行和解後方能終結（Locke, 1991: 279-281）。不過洛克承認，由於自然狀態缺乏共同承認的法律、公正的爭端裁判者，以及無權力以執行裁判結果，故而自然狀態十分地不穩定；爲保護其財產，自然人乃組成國家，置身於政府權威之下（Locke, 1991: 350-352）。雖然霍布斯與洛克對於自然狀態與戰爭狀態有諸多論述，但是在主流國關典範中，霍布斯與洛克對於自然暨戰爭狀態的豐富討論，被化約爲國際體系不存在超越國家之最高權威的無政府狀態假設，構成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基礎。[3]

國家不能類比於自然狀態中的個人，形成國家間無法組建中央權威利維坦的主要障礙，也構成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特殊性。首先，有別於自然狀態中個人能力的相互均等，國家間存在能力的差異。霍布斯定義自然狀態的自然人擁有相同能力，但是國家間能力顯然高低有別，國家並非在能力上相互均等（Heller, 1980: 25）。再者，國家也不如自然人在自然狀態中的脆弱（Boucher, 1998: 147；Bull, 1977: 50）；雖然核武似乎使對峙國家間陷入極度的恐懼與威脅，但是並非所有國家都擁有核武，即使所有國家都擁有核武，也不能促成國家間能力的均等，或是促成對等的安全恐懼（Hellr, 1980: 26）。於是個人間所形成的自然狀態，並不能類比於國家間的無政府狀態（Beitz, 1979: 36-50；Bull, 1977: 46-50；Hellr, 1980；Milner, 1991；Navari, 1982: 204-205）。國家構成的無政府狀態本質與內涵，與自然狀態顯有所不同。

---

[3] 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均界定無政府狀態，爲沒有國家間政府之更高權威的情況（Waltz, 1979: 114；Grieco, 1988: 497；Katzenstein, 1996: 11）。溫特觀點的社會建構主義對於無政府狀態並沒有明確定義，不過強調無政府狀態爲國家所共同建構，故而有多種樣態（Wendt, 1992；1999），不同無政府文化的差異，是這些不同文化內國家間的互動關係，霍布斯無政府文化內國家相互敵視，洛克式無政府文化中國家承認彼此生存但採取競爭方式互動，在康德無政府文化內，國家間關係是朋友。基本上，在國家之上沒有更高權威的無政府狀態，是討論國際關係的基礎（Lake, 2007: 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主要國關典範對無政府狀態的描述

面對國家間沒有更高權威的無政府狀態，國關研究發展出四種路徑，作爲描述國家行爲的基點。第一種路徑是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無政府結構不可變異立場，堅持無政府狀態的單一性與結構性（Waltz, 1979；Katzenstein, 1996: 12）。其次是溫特的無政府文化轉換立場，在界定國家可以類比於個人具有能動性（agency）後（Wendt, 2004），溫特認爲國家間爭取承認（recognition）的競爭，會促使不同種類無政府文化的轉換與更迭，導致無政府文化難以避免的滅亡（Wendt, 2003）。第三種是探索國際體系內的層級（hierarchy）現象，例如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以爲，國際體系的不均等權力分配，使國際體系是一個層級（hierarchy）結構（Kugler and Organski, 1989: 172；Tammen et al., 2000: 6）。雖然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霸權論暗示國際體系的層級現象，但吉爾平的出發點仍爲國際無政府狀態（Gilpin, 1981: 7），並沒有標示國際體系的層級結構特性（Lake, 2009: 60）。雷克（David A. Lake）則是很謹慎地探索無政府國際體系內國家相對關係間的層級現象（Lake, 2009: 62）。不過權力轉移論與霸權更迭論被歸類爲戰爭理論，而不是解釋國際關係的全面性典範。雷克只專注於探索國家間的相互層級權威面貌，並非界定國際體系爲層級結構（Lake, 2009: 62）。最後，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勾勒無政府結構與層級結構的相互轉換現象。英國學派揭示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與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差異，不過英國學派並沒有否定無政府狀態的存在，而是認爲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亦能形成國際社會（Bull, 1977: 46-51），但是國際無政府體系與國際層級體系並不穩定，檢析歷史事實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國際無政府體系轉換爲層級體系，不過層級體系也會轉換爲無政府結構體系（Buzan and Little, 2000）。對主流國際關係典範而言，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理論假設，更是一個影響國家行爲的結構性環境。

主流國際關係典範的論述重點，集中於國家調適無政府結構的種種行爲趨向。人與人競爭的自然狀態，經過華茲（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論述，轉化爲超出個體能力的無政府結構，構成探索國際體系與行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活動的理論核心。華茲對於國際體系與國際結構性作用的討論（Waltz, 1959；1979），奠定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關係典範無可質疑假設的理論優位。華茲認爲，體系分析層次是討論國際政治面貌的最佳路徑（Waltz, 1979），華茲的國際體系論點堅信，無政府狀態與層級狀態二者無法並存，國際體系不存在超越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各單元相互競逐，以自助（self-help）自存，故而國際政治是一個涉及權力（power）、求存（struggle）與調適（accommodation）的最純粹政治場域（Waltz, 1979: 113）。華茲更揭示無政府狀態一旦成型後，國際體系將無意識地複製此種沒有最高權威的無政府邏輯（logic of anarchy）（Buzan et al., 1993: 132）。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即使有追求唯我獨尊地位的企圖，也會在無政府結構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機制約束下，永遠未能實現此種目的（Mearsheimer, 2001: 40-42）。

不過現實主義者對於無政府狀態所引發的國家行爲傾向，有不同的解釋。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爲，無政府狀態使國家處於高度的不確定與高度的不安全狀態，故而國家爲確保其生存的最高目標，會採取自助策略，追求國家權力的極大化，並在謹愼地計算各項策略得失的情況下向外擴張，成爲國際體系的霸權，不過全球霸權的夢想，卻因爲無法克服水際阻隔的權力投射限制，最多只能成爲區域性霸權（Mearsheimer, 2001: 29-54）。相對地，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則對於無政府狀態驅動的國家行爲有較樂觀的看法，認爲只有在某些有限的情況下，例如軍事科技變化導致的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改變，國家才會向外擴張（Glaser and Kaufmann, 1998；Levy, 1984）。守勢現實主義認爲，國家在高度不確定的無政府狀態，其主要目標在於追求安全，一旦安全獲得確保，就會成爲一個維持現狀（status quo）國家（Schweller, 1996）。權力擴張的競爭具有高度風險，所以無政府狀態的高度不確定性，反而成爲國家間合作的動因，以降低國家對安全的疑慮與不確定（Glaser, 1996: 57-60）。國家權力擴張所形成的威脅，必然會招致其他國家的權力平衡抗衡（Waltz, 1979: 124-128；Walt, 1987）。相對地，無政府狀態使國家採取措施以提高其安全，卻使其他國家陷入不安全的境況，故而無政府狀態促成國家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難題（Taliaferro, 2002/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6）。此外，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則試圖解釋具體的國家外交政策，它雖將國際體系視爲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以爲無政府狀態使國家在決策時十分難以捉摸到具體的安全與權力變化，故而有必要將國內層次因素納入解釋模型，以準確描述外交行爲的變化（Rose, 1998: 152）。

新自由制度主義接納國際體系不存在中央權威的假設，同意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爲允許中央機關向普世施展正當且具拘束力的權力與權威之全球法律體制，並不存在於國際體系（Stein, 1990: 8-9）。新自由制度主義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導致的國家決策束縛，不過對於無政府狀態的本質與影響，與結構現實主義有不同的看法（Baldwin, 1993: 3-4）。新自由制度主義界定國際無政府狀態，乃是在世界政治中沒有共同政府（Axelrod and Keohane, 1985: 226；Keohane, 1984: 7；Stein, 1983: 116），於是國際政治中沒有規則的執行機關，亦未能制定行爲規則，或是要求國家間進行合作，故而，國際體系充斥著欺騙與詭詐（Axelrod and Keohane, 1985: 226）。對新自由制度主義而言，因爲沒有國際中央權威以要求各國兌現承諾，欺騙與詭詐乃成爲國家間合作的最大障礙。假設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中是極大化其獲益（Axelrod, 1984: 6），更借用經濟學的市場假設，以爲在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乃爲一個理性而且有自主性的行爲者（Keohane, 1984: 27），新自由制度主義主旨，是在未能脫離無政府狀態的侷限中，探索促成國家合作的可能，解決國家面臨的國際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最佳化國家的長期與整體效益，以實現共同利益（Oye, 1985）。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爲，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運用改變回報（pay-off）的策略，輔以對於未來情勢的考量，結合懲處背叛的設計，可以促使國家願意延續現有的合作互動（Oye, 1985）。接受國家無法脫離無政府狀態的束縛，新自由制度主義闡述，國家仍可能以合作方式，追求國家利益（Axelrod and Keohane, 1985），國家組建的國際制度，可以約束國家行爲，帶來國際穩定（Keohane and Martin, 1995）。因此，一如結構現實主義的國家調適觀，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爲國家仍能透過組建國際制度等合作手段，適應無政府狀態的競爭狀態，保障國家利益。

溫特主張的社會建構主義，雖也承認社會性之國際體系爲無政府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ndt, 1999: 309），不過他質疑所謂無政府邏輯的單一性，認爲國家的互動實踐，可以建構出不同共享知識所構成的無政府狀態（Wendt, 1992），進而產生歧異的國家利益界定與國家行爲（Wendt, 1999: 246-312）。溫特直言，無政府結構乃是由共享知識或文化之概念分配所組成，它可以被名之爲霍布斯式、洛克式與康德式等三種無政府結構（Wendt, 1999: 246-312），還有第四種的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式無政府文化（Wendt, 2003: 520-521），故而所謂的無政府邏輯，也會隨著概念分配的變化，而有所更迭（Wendt, 1999: 309）。溫特反駁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的國際無政府結構一元論主張，也承認國家的互動實踐，難以輕易地改變無政府共享知識結構（Wendt, 1999: 314）。不過溫特循目的論解釋（teleological explanation），發展無政府結構最後必然會導致世界國的無政府狀態線性轉換觀點。他採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承認鬥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觀點，聲言國家與個人對彰顯其主體性的承認競爭，與逐漸無法承受的戰爭成本，構成個體層次（micro-level）因素，匯同總體層次（macro-level）的無政府文化轉換過程，歷經國家體系（system of states）、國家社會（society of states）、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等階段，最終無可避免地進入終結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國階段（Wendt, 2003）。但是溫特的線性無政府文化轉換觀受到不少質疑；例如此種目的論框架根本否定國家的能動性，與社會建構理論相互矛盾（Shannon, 2005）。此外，有論者認爲黑格爾的承認觀，無法促動無政府文化的自我轉換（Greenhill, 2008）。溫特的世界國路徑，更被批評是一個無法證僞（falsifiable）的論點（Keeley, 2007: 422）。有別於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溫特勾勒出國家適應無政府狀態後的多重可能態樣，甚至包含無政府狀態的結束。

三、無政府假設面臨的挑戰

無政府假設的理論解釋力受到諸多質疑。懷疑無政府假設者認爲，國際關係典範低估無政府狀態的模糊性，誇大無政府狀態的重要性，忽略國家的互賴關係，結構現實主義過度關注無政府狀態的作用，導致理論的過度簡化（Milner, 1991: 84-85）。再者，無政府狀態的結構穩定性觀點，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忽略體系變遷轉換的可能性（Ruggie, 1983），它不能說明層級體系變換爲無政府體系的動因，更無法說明國際體系從無政府結構轉換爲層級結構的原因與過程。[4] 溫特的無政府文化轉換觀點，也被批評過於線性，忽視不同種類無政府文化交錯重疊或倒退演化的可能性（Shannon, 2005: 587）。就歷史實踐而言，層級國際社會的存在時間，也超出無政府國際體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個國際政治體系可能被建構爲無政府狀態，也可能被建構爲層級狀態（Buzan and Little, 2000: 233）。

時至今日，堅持無政府狀態假設的美歐國關典範，已無法完成描述與解釋國際政治現象的理論要求，解釋甚至預測國際體系變遷的能力亦屬有限。[5] 首先，立基於無政府狀態假說的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東亞國家曾經長時間維持層級國際體系的事實（Kang, 2003；2003/2004；2010）。再者，無政府結構下的國家行爲模式，也未必促成全球權力分配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樣態，至少權力集中於美國的單極獨霸狀態，已經維持很長地一段時間。結構現實主義雖預言單極體系的必然崩潰（Layne, 1993；Mearsheimer, 2001；Waltz, 2000），卻貧於解說單極體系存續的原因。過往的國家實踐顯示，組建層級體系的案例並不少見（Lake, 2009），歐洲整合的成就，更是當代部份國家組建超國家利維坦的具體例證。

從理論與實踐而言，無政府狀態假設已顯示其不足之處，國際關係研究有必要尋找一個更適當的理論典範假設。長久以來，承襲美歐國關典範的思考路徑，受限於當代主義（presentism）、去歷史主義（ahistoricism）、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無政府主義偏好（anarchophilia）與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的束縛，未能建構一個正視全球歷史演化視野的國際體系研究途徑（Buzan and Little, 2000: 18-34）。國際關係研究社群，不

---

4 華夏文化中戰國時代被秦國統一建立帝國的過程，顯示無政府狀態是可能被打破，並且轉換爲層級體系。

5 國際體系變化有三個層次，分別是一、政治體系本身特質從無政府狀態轉換爲層級狀態，或者是行爲者本質改變所構成的體系更易（systems change）課題；二、體系內部權力分配、規則與威望的轉換等所揭示的體系內變化（systemic change）；以及第三項的互動變化（interaction change），關注體系內行爲者之間互動模式的變化（Gilpin, 1981: 39-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乏運用春秋戰國之國家互動模式，映證美歐權力平衡實踐的理論侷限性（Chan, 1999；Hui, 2007），但相對而言，西方國關社群對於運用華夏國際實踐於充實國際關係典範，仍是十分無知與不足（Johnston, 2012）。最後，對整體國關研究社群而言，無政府狀態是一個論證假設，它並不等同肯定無政府結構的穩定性，而且國際關係中出現層級現象亦不容否認，如何從無政府狀態假設演釋出更具有解釋力的典範論證，似乎才是當下應努力的方向。

貳、無政府狀態探索先秦國際互動的限制

華人國際關係研究者，仍傾向運用國際無政府假設的國關典範，作爲解析先秦時代國家互動的分析基點，並且不同程度地認定，先秦時代是一個無政府結構國際體系。首先，採用國際體系內單元之間存有同質性的理論基礎，認爲古代中國，與近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有可類比性。有鑑春秋時期周王朝中央權力逐漸衰弱，諸侯國之上缺乏最高權威制約，同時諸侯國又都以其內部認同和武裝力量爲重要特徵，因此認定古今的「國家」都具有相同之處（陳玉聃，2008：107）。楊倩如和吳征宇更直接地認爲，先秦時代諸侯國已經具備現代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特徵，相互間不但存在密切而且複雜的互動，而且在國家間關係和國內政府和社會關係上，也都與近代以來歐洲的情形十分類似（楊倩如，2009：14；2010：97；吳征宇，2008：137）。於是，以國際無政府體系的運作概念，檢視春秋戰國時代的國家互動，至少在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者眼中，已有一定的共識，不過也必然地遭遇無政府狀態假設之理論描述有限的困境。

界定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可類比於當代的國際無政府結構後，運用結構現實主義強調之極態（polarity）權力分配狀態，區隔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面貌，構成第一種理解先秦國際結構的路徑。王日華認爲西周時期乃是以周王權爲核心的單極霸權體系，戰國時代則已轉變爲多極體系（王日華，2009）；余麗認爲夏、商、西周時期是一種以共主爲中心的單極國際體系（余麗，2010：106），到春秋時代，周王室逐步失去共主的地位，於是單極國際體系瓦解，各國紛爭不斷，爭奪霸主地位（余麗，2010：107）。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是說，華夏文明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一個國際體系，而不是中央權威集中的一統王朝，至於周代更是國際體系由單極轉化爲多極，最後再歸向於統一帝國的過程。戰國時期七雄的出現，以及周王室的名存實亡，顯示戰國初期的權力格局是一個典型的多極體系（書宗友，2005：63），秦國統一六國之前，已是進入單極體系（書宗友，2005：75），最後秦國征服各國，建立一統帝國，結束華夏民族自夏、商、周以來的國際無政府體系之霸權更迭。此種無政府國際體系的極態定位，可以勾勒春秋戰國時期發生體系變遷的特性，卻一如當今的主流國關典範缺點，不能解釋戰國諸國最終脫離無政府狀態，組建一統帝國的體系結構／行爲者因果源由。

再者，在以物質權力爲主要區隔變數的基礎上，參考規範制度的疏密程度，構成另一種理解春秋戰國時代國際結構的路徑。楊倩如將秦統一天下前的國際體系劃分爲權力平等型（堯、舜、禹時期）、王權等級型（夏、商、西周時期）和霸主結盟型（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三種類型（楊倩如，2010：99-111），西周時期是王權等級型國際體系的典範（楊倩如，2010：108）。霸主結盟型國際體系，是西周體系逐漸崩解後，不同程度的回歸與改良，在此種國際體系中，不斷地出現依靠軍事實力、經濟利益和外交戰略而形成的新霸主與聯盟，最終爲實現疆域、政治、文化、族群的大一統奠定基礎（楊倩如，2010：108）。楊倩如的分類雖奠基於物質權力的聚合，不過也強調觀念建構在國際體系變遷過程的作用，認爲西周時代的等級秩序與制度規範，均對維護國際體系的長期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楊倩如，2010：110）。但嚴格而言，楊倩如以權威分配取代物質權力分配，[6] 仍然沒有解釋先秦時代發生體系變遷與體系更易的根源，也沒有發現以無政府結構爲論述核心的內在論證矛盾。

最後，從無政府狀態的對立面，也就是層級體系的聚合，看待春秋戰國的國家互動，構成第三種理解春秋戰國際體系的觀點。周方銀認爲從西周到春秋時期，是一個體系層級性逐漸鬆散化的過程，戰國時代體系逐漸進入較爲典型的無政府狀態（周方銀，2010：6）。春秋時期，諸侯「尊王」

[6] 延伸權力分配的概念，權威分配意謂，國際社會內統御權威核心是大部份集中於一方，兩方或是多方的情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最高點出現在體系由嚴格層級體系轉向鬆散層級體系的前期階段，之後爭霸諸侯「尊王」水準逐漸下降，直至完全流於形式（周方銀，2010：32）。此種看法以層級體系權威流逝的過程，檢視周王室與霸主之間的權威爭奪，試圖理解此一過程中不同行爲體之爭霸行爲（周方銀，2010：14）。於是，權威的分配狀態，成爲一種檢視春秋戰國之國際體系格局的路徑。不過此種以權威爲結構變數的嘗試，雖說明西周初期由層級體系變動到戰國時期多極無政府狀態的事實，以爲尊王乃是一種爭霸手段，卻無法解釋爲何在體系變化的過程中，仍有此起彼落創建層級式霸業的努力。周方銀的觀點，是否有意推翻無政府假設，或是比附西方學者有關在無政府狀態中建立區域層級關係的觀點，都有待更清楚的論證說明。

不可諱言，近期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定位春秋戰國時期國際體系的努力，仍借鏡於結構現實主義或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認識，在論證春秋戰國時期屬於無政府狀態之後，再運用物質權力或是觀念分配的方法，界定春秋戰國時代的國際體系樣態，解釋春秋戰國時代國家互動，進而企圖理解華夏民族處理國際關係的理論模型，推定中國在全球體系內的行爲取向。不過這些研究發現，多是在假設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物質性先驗存在的基點上，運用已有的國關典範視角，審視春秋戰國時代的國家互動，提出各家的觀察發現，並沒有發覺無政府結構假設與先秦國家實踐的矛盾。

中國大陸國關研究社群的努力，值得正面的肯定，不過問題在於，吾人習慣的無政府國際結構假設下的各種分析途徑，都只在討論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的體系內物質權力分配、規範或是制度的流散聚合，而未能（或根本無意）解析國際政治體系之無政府結構與層級結構相互轉換的源由。因此確認先秦的無政府體系結構本質，固然能論證無政府國際體系內國家行爲者的互動傾向，卻未能解析由西周層級體系轉移到春秋戰國極端無政府狀態的源由，未能概念化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爭奪體系層級式主宰地位的理論根源，更不能提出由無政府結構轉換爲層級體系的理論基礎。運用美歐的無政府狀態假設，試圖解析華夏文明的國際關係實踐，好似是削足適履，在無政府假設的論述困境中掙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先秦諸子脫離無政府亂世的觀點

從先秦時代重建權威秩序的政治思想出發，或許可以提供吾人理解先秦國際體系變化的理論啓發，修正國關典範無政府假設的研究限制。先秦諸子百家雖各領風騷，主流的儒、墨、法家學說卻有批判無政府失序，崇尚層級秩序的共同特點。此種排斥亂世無政府狀態，塑造治理權威的觀點，成爲中華政治思想中，行爲者可以掙脫國際無政府結構的原創性理論濫觴。

先秦政治思想家對於自然原始狀態的描述，與西方的政治思想十分雷同，認爲自然狀態產生動亂，個人作爲政治互動的基本行爲者，在追求個人私慾的情況下，與他者進行求勝爲要務的權力爭鬥。但是各家論述對於無政府亂世下行爲者的互動特徵，多是點到爲止；儒、墨、法三家的論述核心，在探索一個已經脫離原始狀態的層級體系，陷入「禮崩樂壞」的無政府化路徑後，如何返回或是重塑有序的治理秩序。儒、墨、法各家思想完全否定苟安於亂世，只求適應無政府結構的治國方略、對外政策、與涉及未來的大戰略展望。即使被視爲適應亂世的老子，也承認國家間存在上下秩序。[7] 總結而言，先秦主流學說，多關注超脫無政府亂世的應對方策，否定國家只求適應無政府狀態的正當性與必然性，與當今國關主流典範認爲無政府狀態會永恆存在的觀點，存有極大的理論歧異。

一、儒家的撥亂反正王道治理論

否定無政府狀態，強調層級秩序的優點，批評中央權威崩解後的失序缺失，是儒家基本的態度。[8] 孔子認爲，一個政治社群的穩妥，應該是建立在層級秩序之上，所謂天下無道，代表層級體系內各行爲者之行爲、角

---

7 老子承認國家間的高低從屬關係，認爲謙下乃是大國兼併宰制下國的最佳手段。請參考《老子道德經》第 61 章：「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老聃著，河上公注，1998：378）。」

8 孔子根本無意討論暴力與失序混亂；《論語》〈述而篇〉記述，「子不語怪，力，亂，神」（孔丘著，何晏集解，1998：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色與地位的失序，具體象徵就是天子失去規範制度暨軍事征伐的優勢地位；如果天子之下的諸侯國享有規範制度暨軍事征伐的領導地位，諸侯大夫而非周天子領導政治運作，以及一般庶人議論政事，都構成天下無道的表徵。

>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9]

因此，就儒家的宗師孔子而言，層級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核心價值，周天子權力地位的下降，代表著此種完美政治體制的失靈；至於從中央權威集中的層級狀態，轉移至權威流散到各不同行爲者的其他狀態，爲孔子所根本否定。但是，仁人君子取得政治體系內的主宰性地位，無寧是儒家仁者無敵於天下的必然，[10] 有鑑原始狀態並非最佳的政治治理狀態，因此政治菁英君子仁人應努力的方向，是重塑次序井然的層級宗法制度。對孔子而言，春秋時代的亂世，並不是遠古自然狀態的延續，而是脫離無政府狀態進入層級體系後的失序反動，其解決之道，在於重塑層級秩序。

儒家在春秋時代對無政府狀態避而不談的立場，至戰國時代不得不有所調整。孟子提出治亂循環論觀點，認爲天下處於有秩序層級治理與邪說暴行亂世的一治一亂交替現象，而孟子所處的時代，乃是世衰道微、臣弒君子弒父、沒有上下尊卑的亂世，此種失序情況，更受到否定尊卑秩序的學說所鼓動，而愈發惡劣。

>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9　出於《論語》〈季氏篇〉（孔丘著，何晏集解，1998：77）。

10　請參考《孟子》〈離婁篇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軻著，趙岐注，1998：58）；孟子引述孔子立論，「仁不可爲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軻著，趙岐注，1998：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1]

孟子很自然地要求從亂世走向治世，故而傳播其主張，以圖導正人心，制止邪說，扭正惡行（孟軻著，趙岐注，1998：55）。面對權威流散的局面，儒家代表性人物荀況，開始檢視亂世的種種面貌，並且提出脫離此種無政府狀態的解決之道。荀子申論，亂世是一個混亂危險的狀態，各行爲者彼此之間進行殊死鬥爭，以權謀相互爭奪，而且各行爲者之間不存在階級界限，享有知識的智者以及品行端正的賢人，反而被不遵循禮義規範的低層行爲者所凌駕，一般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治理者則極其辛勞。

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極勞苦。[12]

此時，孟子已不再試圖復興周室，而期待新王的崛起（蕭公權，1982：99）。荀子的論述中，也隱含無意重塑周代宗法層級制度，認可另起爐灶建立王道層級體制的可能性。[13] 在孟子與荀子看來，政治體系的主宰地位，乃是脫離無政府混亂，重塑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

有序狀態優於無序狀態，構成儒家論述的理論核心假設。原已走出自然狀態的西周層級體制之崩毀，導致無政府亂世，因此孔子、孟子暨荀子論述的核心，認爲應該努力掙脫亂世的失序狀態，重整秩序權威，回到有序狀態。孟子直接主張天下一統的層級秩序立場。孟子秉持民爲貴的立論，修正孔子意圖重建周室中央權威的手段，鼓勵君王應循仁政一統天下，建構層級秩序。孟子鼓勵如魏、齊等當時大國能夠一統天下，他也期待如宋國之小國，能行無敵於天下的仁政，以王道得天下（蕭公權，1982：99）。

孟子以爲重建一統層級治理秩序的最佳手段，乃是不受物質力量高低限制的「仁者無敵」與王道治理方法。孟子舉商湯爲例，認爲即使是實力

[11] 出於《孟子》〈滕文公篇下〉（孟軻，1998：54）。
[12] 出於《荀子》〈王霸篇〉（荀況，1989：69）。
[13] 請參考《荀子》〈正論篇〉，「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震動從服以化順之」（荀況，1989：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百里的小國君王，如果施行省刑罰薄稅斂等照顧百姓的仁政，則他國人民將自動順服，期待王師去除其統治者，以能早日納入仁君的統治之下。

>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14]

孟子滿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仁政手段，反映孟子重視爭取人民順服，進而脫離治亂循環，永續維持王道層級秩序的思想特點。

荀子認爲，治理制度是統治者協調人類慾望訴求，以及物質資源供給間之均衡的產物。[15] 有鑑人性被慾望支配的特性，荀子認爲所謂聖人，具有制定禮義等規範性制度的動機，以改正一般民眾性情，達到治理與秩序的目標。[16] 荀子重視有德性領導人的先驅性，認爲君子的作爲是塑造秩序的核心，如果沒有德性領導人的作爲，將會導致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他認爲空間是生命的起源，但是治理秩序則源自於禮義等規範性制度，而規範制度之成形，則有賴德性領導人（君子）的主導。

>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17]

---

[14] 出於《孟子》〈梁惠王上〉（孟軻著，趙岐注，1998：8）。

[15] 請參考《荀子》〈禮論篇〉，「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況，1989：109）。

[16] 請參考《荀子》〈性惡篇〉，「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荀況，1989：138）。

[17] 出於《荀子》〈王制篇〉（荀況，198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荀子堅持儒家對於層級體制的偏愛，荀子對於聖人與權威地位劃定者的強調，實際已爲終結無政府狀態之正當性，提供充份的養份，鼓勵具有物質權力暨規範性資源優勢的行爲者，在競爭狀態中爭取主宰領導地位，扮演領袖群倫的唯一權威。孟子與荀子對於王道與霸道的優劣比較，不過是反映重塑層級有序體制的路徑優劣，以及維持此種層級體系的成本效益分析，[18] 其核心論點，在於創建一個次序等列的層級體系，它可以扭轉以下犯上的國際無政府體系，整肅尊卑不分的國家內部混亂。

二、老子的大小共存自然層級觀

道家中的老子學說，從滿足大國與小國欲求利益的角度，認爲順應層級秩序是國家身處國際環境的最佳手段。老子學說在戰國時代已爲顯學，荀況與莊子對老聃各有褒貶，《韓非子》內有「解老」與「喻老」兩篇，對映《戰國策》內遊士引用老子學說的記載（馮友蘭，2014：203），均可以發現老子學說的重要性。老子學說重點在於濡弱、謙下、寬容、知足與見微，其政治哲學之核心在無爲（蕭公權，1982：177-183）；相對地莊子學說則在追求無治的理想，以不治治天下，然而其立論與老子並不相同（馮友蘭，2014：263；蕭公權，1982：177-189）。

清靜無爲的老子學說看似與建構層級秩序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觀察老子學說的處世特徵（馮友蘭，2014：215），老子學說仍有接納層級秩序的面貌。例如老子就認爲國家間存有大國與小國的現象，而且認爲大國在此種權力地位高下有別的環境中，其所處地位是爲天下之母與天下之牝，是萬物生養與谿谷匯流之所在，其欲求不外是兼併土地順服小國，而小國目標在順奉大國求生。老子認爲謙下，是達成大、小國家目標與上下順服秩序的重要手段；依據大國爲天下滋養核心的特性，靜則能勝，所以要達成大國目標的最佳方法，就是大國持靜下流，大國對小國謙下，則取小國，小國對大國謙下，則爲大國所取，滿足小國事大生存的需求。

---

[18] 有關孟子與荀子對於王道與霸道的觀點，反映著兩人對於實現創建層級體系的不同觀點。請參考《孟子》〈公孫丑篇〉（孟軻，1998：28)與《荀子》〈王制篇〉（荀況，1989：44-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19]

老子同時滿足大國取人與小國爲大國所取的論述，隱含支持上下有別層級秩序的意涵。此外，老子期望的理想社會，也不是回復到個人共存共生的自然狀態，而是順應於萬國林立的鄰國相望不相往來老死的狀態，此種理想狀態並非毫無高下相互平等，而是存在大國與小國的順服秩序。

>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20]

相對地，道家中的莊子則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認爲各種追求治天下的政治社會制度安排，不過是造成天下紛亂的根源，唯有取消一切分別，才能達到個人的絕對逍遙（馮友蘭，2014：278）。由此觀之，道家中的老子與莊子對於脫離無政府狀態有不同的立論。老子主張在萬國林立狀態中的調適，承認層級秩序的存在；莊子則主張成就個人的適性自由，根本否定社會典章制度的存在價值，以爲國家求治的秩序取向，乃是天下亂源而非治天下的利器。

三、墨子的賢者層級治理觀

承認戰國時期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事實，是墨家在華夏國際關係概念論述的最大貢獻。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政治學說多以亂世一詞，說明無政府狀態的現象，墨子開始正視周代層級政治結構生成之前的原始自然狀態，以及此種原始自然狀態的特性。墨子指出，當人民還沒有創建出規範暨治理體制之前，政治個體各自堅持其利益的正當性，所以政治行爲者之

---

[19] 出於《老子道德經》第 61 章〈謙德篇〉（老聃著，河上公注，1998：378）。
[20] 出於《老子道德經》第 80 章〈獨立篇〉（老聃著，河上公注，1998：3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發生相互非難他者利益正當性的現象，即使如父子兄弟也因此而相互仇視不能合作，政治社群內的行爲者，以各種手段相互傷害，不能推動生產、錢財與教育等各領域的群體合作，因此天下混亂，人群如同禽獸般的相互荼毒，不存在君臣與父子等上下關係的行爲暨角色規範。

>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文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臭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21]

墨子貼切地勾勒出自然狀態下人與人相互競爭的面貌，更說明在無政府狀態下克服行爲者相互敵意，推展合作的困難。墨子更明白指出，當時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不存在政治規範之無政府自然狀態的翻版。[22] 因此，就墨家而言，亂世就是一個沒有政治規範準則的狀態，在此狀態內，個別的行爲者堅持其個別利益，不會因爲血緣關係的連結，降低相互敵視非難的競爭強度，而且政治個體之間，也因爲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影響，難以推展合作。

然而一如儒家對重塑權威的熱衷，被評價與儒家論點相互對立的墨家論述，亦認同塑造政治權威，脫離無政府狀態的治亂觀點。墨子認爲，天下無政府紛亂的原因，導因於沒有領導者，所以只要選舉社會內的賢能之士作爲最高政治領導，建構天子－三公－諸侯－正長的層層節制政治層級體系，就能夠重塑秩序，脫離無政府原始狀態的混亂。

>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

[21] 出於《墨子》〈尚同上篇〉（墨翟，1989：21-22）。

[22] 請參考《墨子》〈尚同中篇〉，「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墨翟，1989：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23]

墨家雖然附和儒家重塑層級秩序的手段，但是認爲選拔政治領導者的特質，應該是具備知識以促成天下眾人合作的「賢良聖知辯慧之人」，[24] 而不是具備一定道德規範要求的德行君子。

四、商鞅的威權秩序自發論

法家說明無政府狀態的論述，一如儒家與墨家，認可無政府狀態的高度競爭性，同時肯定創建層級有序體制的必要性。在商鞅的眼中，原始狀態的起點，是個人僅能追溯生之於母而不知其父的時代，不存在上下等級之別，處於沒有中央權威領導者的行爲者，追求自我私利，以利害相結合，採用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個人私利，坐擁物質力量相互競爭，以求超越其他行爲者。這種描述，與霍布斯對於自然狀態的描述，並無差異。

>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25]

有別於儒、墨兩家的觀點，商鞅認爲治理以及權威，源自於下民企求領導者結束無政府混亂的需求。無政府混亂狀態下的個體，爲解決亂世的不安，透過尋求上位領導人的途徑，獲得治理的安定，領導人於是訂定上下尊卑的層級體制，達到治理與塑造秩序的目標。

> 古者民藂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26]

因此，領導權威與層級規範是源於下層民眾的需求，而不是君子仁人的自我期許。依據商鞅的看法，治理權威以及層級體制的塑造，經歷三個

---

[23] 出於《墨子》〈尚同上篇〉（墨翟，1989：22）。
[24] 請參考《墨子》〈尚同中篇〉，「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墨翟，1989：23）。
[25] 出於《商君書》〈開塞篇〉（商鞅，1989：13）。
[26] 出於《商君書》〈開塞篇〉（商鞅，1989：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階段，起初乃是自然狀態，爲求治亂，轉化爲由賢者依仁道引導眾民；隨著民眾數目的成長，仁德引導已無法產生治理效應，遂發展出設立君主／官僚體制統御萬民的層次。

> 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贏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27]

法家的觀點認爲，治理權威源自於眾人的訴求，權威規模的成長擴張，甚至治理制度的精緻化，乃是人群數目成長所日益複雜之治理需求所促成的自然產物。有鑑權威治理以及層級節制，乃是源自於群眾的需求，故而它是一個必然的產物，而且會日益精密成長。商鞅對於無政府狀態的發展階段與轉換的觀點，是華夏政治思想最貼切的描述。

五、先秦重構層級秩序概念的啓迪

先秦儒、墨、法家等主要學說所討論的秩序，與當今美歐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典範所指涉的國際秩序有極大差異。以宇宙爲本之王者觀念爲核心的全面性社會政治秩序觀念，以及涵蓋天人的秩序觀，是先秦主要思想的共同預設（葛兆光，1998：43；Schwartz, 1985: 413），此種追求秩序的情結，構成中華文化的型貌（configuration）（張德勝，1989：159）。先秦儒、墨、法家學派思想在追求一個跨層次的全面性秩序，其涵蓋領域跨越天下－國家－君臣三個層次，其內涵是一個貫通國家內部治理與國家間天下秩序的全面性通則，具體規範上下層級位階、角色界定與行爲要求；在達成秩序的手段上，著重菁英領導者的「內聖」，以提高自我德行，或是精進君王統治手段。美歐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典範對國際秩序的看法則十分歧異（Paul and Hall, 1999: 17-120）；美歐各家典範對國際秩序的指涉領域，只

[27] 出於《商君書》〈開塞篇〉（商鞅，1989：1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適用國際體系的國家間關係，不涉及國家內部的國家－公民關係以及個人間互動。國際政治秩序乃是一群國家間的治理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s），包括基本規則、原則與制度（Ikenberry, 2001: 23），國際秩序有權力平衡秩序（balance of power order）、霸權秩序（hegemonic order）與憲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等三類（Ikenberry, 2001: 22-37）。相反地，先秦儒、墨、法家學所勾勒的國家間完美秩序，只有天下定於一尊的全面性層級秩序樣態。

整體而言，先秦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墨、法家政治思想，都肯定建構層級秩序的必要性。儒、墨、法等主流各家，一致抨擊無政府亂世的缺失，更鼓勵政治領導人，在滿足各家所期待的領導權威要件之下，尋求政治體系內的主宰地位，對內整敕萬民，對外一統天下，[28] 創建一個秩序井然的層級體系。其次，儒、墨、法各家都肯定層級體系所帶來的社會穩定優點。各家對於創建層級體系的手段雖有不同，但都認同上下尊卑的政治層級體系，規範不同行爲者的政治地位與行爲樣態，更可透過中央權威的權力施展，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因此在先秦百家爭鳴的主流政治思想學派中，主宰權威由上而下層層節制的層級體系，乃是儒、墨、法各家學說的重要核心價值。最後，儒、墨、法各家學說雖不否定無政府自然狀態的存在，但無意發展適應無政府結構的國家存續之道，而多著力於掙脫亂世的必然性，以及發展結終亂世的不同方略。各家認爲脫離無政府自然狀態的層級體系，曾經存在運作，解決當下脫序亂世之道，在重塑或是創建新式層級體系。力圖獻上苟安於無政府狀態亂世的縱橫家學說，則爲主流的政治思想學派所不齒抨擊，視爲破弊國家的蠹蟲（王先愼，2002：176-177）。

先秦儒、墨、法家政治思想排斥無政府亂世的立論，與今日美歐主要國關理論典範的無政府假設大相逕庭，也沒有爲中國大陸學者所承繼。儒、墨、法家政治思想雖承認當時天下處於亂世的無政府狀態，不過其論述的出發本體，乃是一個有秩世界，將無政府亂世視爲有秩天下的反動，並不

[28] 一統天下已是戰國時代儒家重整政治秩序的期待；請參考《孟子》〈梁惠王上篇〉「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孟軻著，趙岐注，19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承認無政府亂世的存續價值，更不認爲國家應接受失序狀態。相對之下，當今美歐主要國關理論典範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本體根源，是奠基於無政府假設，而非奠基於有秩的層級結構。今日某些美歐國關理論典範對層級權威治理的關注，看似呼應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墨、法家對層級體制的堅持，不過其核心仍執著於國家調適無政府狀態的各種層級情境描述，吝於承認層級秩序的結構性與價值性優位。中國大陸戮力發展的「中國學派」論述，雖聲言借鏡先秦政治思想（閻學通、徐進編，2009：1；周方銀、高程主編，2012：3），討論華夏文化的層級式天下觀與朝貢體系的運作，並未脫離美歐中心論的無政府假設與各種主要國關典範的論述框架，卻可能淪入中國中心論的一廂情願陷阱（王存剛、劉涵，2013：148），其關鍵在於忽略先秦超越無政府狀態觀點的重要性，未能以華夏政治思想的秩序取向觀點，營造對應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本體論，發展出具體的國際政治典範。

於是，有別於探究國家調適於無政府結構權力競爭的美歐主流國關理論典範，撥亂反正構成儒、墨、法各家學說主流政治思想的共同基點。[29] 儒、墨、法各家主張政治領導人應該終結亂世，或是運用物質權力的集中，或是以仁義德性吸引群眾支持，創建主宰性領導地位，營造一個秩序井然的層級政治結構。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儒、墨、法各家學說，雖然構思出不同的一統天下路徑，但是爲君王爭取國際主宰地位的作爲，推動國際體系脫離無政府結構，鋪陳有力的論述基礎。

[29] 吾人必需承認，道家學說並不支持撥亂反正的看法，甚至以爲各種撥亂的制度安排建構，不過是使世界更加紛擾的亂源。老子主張以謙下適應有序狀態中的一切安排，趨吉避凶。而莊子則是追求個人的絕對自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先秦主要思想與美歐國關典範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

		對無政府狀態特徵的描述	對無政府狀態的評價	無政府狀態的穩定性	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行爲	脫離無政府狀態的路徑	塑造層級秩序的策略
先秦諸子論述	儒　家	層級體系的反動失序。行爲者行爲、角色與地位錯亂。	不承認無政府失序亂世的價值。	治亂循環(孟子)	不應容忍無政府亂世。	重塑層級秩序	國君自我期許的內聖王道仁政，一統天下。
	老　子	※	未言明，但認爲存在上下層級關係。	※	※	※	謙下
	墨　子	個人對規範公理的自我詮釋競爭。沒有最高權威規範，沒有最高領導人。	人類如同禽獸般相互荼毒。	※	※	塑造層級治理秩序	選拔賢良聖知的政治領導人，建構由上而下的層級治理秩序。
	法　家	個人相互追求私利的競爭，沒有最高領導人。	亂世	※	不應容忍無政府亂世，應追求王霸主宰地位。	人民渴求秩序的自發作用，塑造層級秩序。	強化國家權力的富國強兵一統天下。
西方國關理論	結構現實主義	類比於個人競爭的戰爭狀態，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	無優無劣	難以顛覆	國家被迫在結構內苟且求生。	不可能存在	僅能在有限範圍內組建層級狀態，不可能全面顛覆無政府結構。
	新自由制度主義	類比於個人之間的自然狀態，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	無優無劣	難以顛覆	尋求合作舒緩無政府壓力。	不可能存在	有限範圍的制度與規範建構，不可能全面顛覆無政府結構。
	社會建構主義（溫特）	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	※	逐步轉型走向世界國	逐步轉型脫離無政府狀態。	走向世界國	個人與國家的承認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未明確表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先秦脫離無政府亂世的實踐

脫離無政府狀態，是先秦各種政治理論的核心訴求，更激勵稱霸國際體系的國家實踐。面對春秋時代臣下弒君屢見不鮮的教訓，安內方能攘外的治亂方策，成爲華夏文化政治領導人脫離無政府狀態束縛的不二法門。春秋時代齊桓公與晉文公「尊王攘夷」政策，無疑是先秦時代在外部無政府狀態環境中，以尊王爲名，取代周天子地位，取得權威支配地位的重要嘗試。尊王政策雖可以暫時在各諸侯國間重塑層級體系的穩定狀態，卻無力應對封建宗法制度崩解後，諸侯君王面對內部無政府失序的嚴苛挑戰。號召「尊王攘夷」政策的齊桓公與晉文公，雖在周天子中央權威衰敗的世局中重整層級秩序，但兩國先後被臣下篡逆的事實，亦給戰國各諸侯國君王一個血淋淋的教訓，唯有對內鞏固國君權勢，對外爭取國際體系主宰地位，雙管齊下，方是維繫霸業千秋持久的有效路徑。

一、春秋時代的無政府惡化

春秋時代，是一個周天子中央權威體系崩解的過程，也是重塑另類層級體系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諸侯以爭霸方式爭取主宰地位，營造有別於周天子層級權威體系的國際主導地位。如果吾人將西周視爲一個核心支配邊陲的層級體系，則在春秋戰國時代天子權威日趨衰微的過程中，假借重整權威支配核心，而非取代周天子地位，成爲春秋時代建立支配霸業的正當性基礎（周方銀，2010），齊桓公與晉文公先後採取「尊王攘夷」政策，試圖以不威脅現存周天子層級體制的作法，透過「尊王」之舉獲得周王室的正式認可，取得王室給予的封號，透過合法的程序，獲得一個高於其他諸侯的優勢地位（周方銀，2010：11）。周方銀認爲，有別於霸權論暨權力轉移論有關霸權與崛起國直接權力競逐的模式，春秋時期的成功霸主，不僅要獲得實力排序中的優勢地位，還要努力使此種優勢地位得到廣泛的認可，從而使自身在體系內獲得一定的權威（周方銀，2010：9）。但問題是，如果齊桓公等五霸是透過霸權治理，營造架空（或是取代）周天子的另類層級體系，爲什麼這種霸主層級體系未能阻止無政府狀態的惡化趨向？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輯而言，此時討論周天子權威衰微與物質權力下降，已經沒有意義，因爲周天子已不是春秋時代權威層級體系的核心價值。相對地，齊桓公等諸侯霸主創建之鬆散層級體系，未能阻止春秋時代走向國際環境的全面無政府亂世，此一事實突顯孔子重塑古代層級制度主張的缺失，它非但不能撥亂返正，更不能阻止國家體制與國際體系的全面無政府化。因此，滿足政治行爲者克服內外環境無政府動亂的論述，構成戰國時期主流思想的核心訴求。

諸侯內部無政府趨向的惡化，似乎是促成春秋時代無政府混亂逐步深化的主因。首先，春秋時代的無政府趨勢，並沒有因爲霸主的出現與主宰地位的轉移，而有頓挫的現象。周天子爲核心的層級體系，在春秋時代被五霸爲核心的鬆散層級體系所取代，春秋五霸的出現，接續地製造出小國附庸扈從霸主的效應，五霸之間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霸權爭戰（周方銀，2010：10），可是，霸主營造的層級體系重塑效應，並沒有阻止政治體系日趨失序的無政府惡化。相對地，這些鬆散的層級體系重塑效應，反因爲霸主內部的無政府傾向而相繼解體，霸主內部治理的無政府化，更加速外部國際環境的無政府紛亂。其次，各諸侯國內部君臣上下權威關係的劣化，成爲牽引春秋時代深化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動力。春秋時代卿大夫權力凌駕國君，最後專權國政，甚至弒君犯上取而代之的案例層出不窮。宗法封建制度帶來周天子的衰敗，同樣地，諸如齊國與晉國等霸主國家，將透過軍事擴張而來的領土，分封給世家貴族與軍功新貴作爲采邑，只是重蹈周天子層級秩序解體的覆轍（趙鼎新著，夏江旗譯，2006：46），霸權國家的內在崩解，更反映重塑西周層級體制以求終結亂世的侷限性。

最後，有限地在國家間層次重建層級秩序，並不能阻止禮法解體的無政府亂局深化。司馬遷總結春秋時代，「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司馬遷，2002：415），已經明顯反映春秋時代隨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全面性禮法崩壞（司馬遷，2002：415），邁入無政府亂世，而且此種無政府亂局，並沒有因爲霸主國家重建有限層級體系的努力，而略有停頓。也就是說，春秋時代政治體系之體系單元（unit）界限已全面打破，春秋時代政治體系的單元不應是諸侯國，而是卿大夫的各「家」，於是在諸侯國層次的權威主宰重現，根本無助於防阻春秋時代走向全面的無政府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戰國時代的權威強固

步入戰國時期，春秋時期由層級體系再無政府化的教訓，促成戰國時期的國家治理制度改革，推動兼併土地的大國爭戰，更在營建層級權威的政治思潮引領下，發生扭轉無政府結構的作用。首先，鞏固內部威勢，營建專制王國，是戰國時期君王克服無政府混亂失序的第一個特徵。內部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威脅，驅策戰國時代的各國君王，競相追逐組建專制國家機制的強國之道，[30] 更滋長一統天下的野心。[31] 自戰國時代的魏國率先進行政治改革後，被稱爲戰國七雄的諸大國，亦先後推展內部政治改革，組建由國君直接掌控的官僚體系，由國家直接任免的地方郡縣統治機關，頒行法律，進行戶口登記，以利進行軍事動員與賦稅勞役徵集，連坐法的推行，更是強化君王的統治主宰地位（楊寬，1997：216-239）。

國家權威集中於君王後，施行追逐主宰地位的具體策略，是終結戰國時期無政府亂世的第二項實踐特徵，同時反映戰國時期各國主觀企圖終結無政府狀態，創建層級體系的能動性。回應同時解決內部與外部無政府環境的實務需求，各家思潮紛紛提出強國之道的治國方略，以滿足各國君王對內強固王權對外擴張的戰略目標。儒家主張以王道取天下，以王道治天下。孟子認爲取得天下的王道在於保民（孟軻著，趙岐注，1998：9），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使青壯者能免於賦役的徵集，有餘時修養孝悌忠信德行，事奉父兄長上，則可以保衛國家抗拒強國的侵略（孟軻著，趙岐注，1998：8），孟子認爲只要君王以仁善收取人心，則能收服天下（孟軻著，趙岐注，1998：67）。荀子對如何以仁德取天下的王道，有較具體的說明；他認爲王道要修禮、富民與爭取百姓臣子的服從，輕賦稅，用人善任並且使百姓富足，就能夠爭取天下民心（荀況，1989：44-52）。建立王道關鍵乃是施行仁義，核心是以仁德收天下，使人民百姓願付出勞力而使國家富足，使百姓願爲其付出生命保護國家而強大，因爲

[30] 以商鞅獲得秦孝公任用爲例，秦孝公起初對商鞅誘說的帝王之道興趣缺缺，商鞅改以闡述強國的霸王之道，反吸引秦孝公重用（司馬遷，2002：50-51）。

[31] 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中，齊宣王已暗示他有取天下的大欲（孟軻著，趙岐注，199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到百姓的讚譽支持而有榮耀（荀況，1989：69）。

荀子對霸道取得天下主宰地位的手段亦有所評述。他認爲霸道對內在於提昇國力，透過開墾農地增進財富，進而選擇勇猛的軍士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武力，而且強化法律治理；對外則是要維繫其他國家的生存利益與安全，護衛小國並且懲處侵略國家，而沒有兼併擴張的野心，如此可以爭取各國的親近與順服（荀況，1989：46）。所謂的強道，就是今日西方國際關係所強調的國家物質權力成長，邁向以力勝人的軍事強國（荀況，1989：46）。不過荀子批評強道取得天下的成本太過高昂，因爲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必然會反抗侵略，而且戰爭手段也會傷害本國人民的利益，引發人民的厭惡與反戰情緒，反而削弱本國的國力，而且一再的擴張又會製造他國的仇視，因此並不是一個可取的手段（荀況，1989：46）。對於爾後已經可以預見秦國即將統一天下的韓非子而言，爭取國際體系內的主宰地位，已經是國君的最大利益與終極目標，法律賞罰約束官吏與百姓，是達成此一國家目標之最有效手段（王先愼，2002：163）。

如何維繫取之不易的國際體系主宰地位，是荀子對於今日國際關係霸業治理的卓見。荀子認爲，王道在爭取百姓人心，霸道在爭取諸侯貴族的親近，而強道在於兼併土地（荀況，1989：90），但是取得人心、親密感與土地之後，如何維繫此種主宰狀態的長久，才是重點。於是他提出「堅凝」的觀點，以政令維繫人民的順服，以禮義規範凝聚貴族知識份子的支持（荀況，1989：90）。相較之下，其他政治思想流派並沒有如此精細的區隔，似乎認爲取天下的手段，也就是維繫主宰地位的相同手法。爾後秦王朝覆沒的歷史驗證，法家以嚴刑維持主宰地位的手段，畢竟有其限制，未必是延續霸業治理的長久之策。自然，戰國時期各國的實踐反映，以仁德信義稱王成霸的實踐手段，仍不敵國家權力的實際較量。至戰國末期，韓非子所稱的「霸王之道」（王先愼，2002：12），已經失去原先以仁義取天下的王道與霸道手段描述，而成爲取得天下主宰地位的代名詞。王霸兩字在先秦時代的字意轉變，映證奪取國際體系主宰地位已成爲國家（秦國）終極戰略目標的同義詞，至於孟子或是荀子所指涉的王道與霸道意涵，被塗抹爲儒家政治理想的幻影。

最後，內部權力成長路徑的勝出，構成戰國時代的最後一種國家行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踐特徵。戰國時代各國處於無政府亂世，明確地感受到生存安全的威脅，[32] 透過外部結盟匯集力量，以及運用內部的政治改革，提振內部權力，更是戰國時代主要大國相互學習仿效，創建「富國強兵」之國家戰爭機器的路徑。魏、楚等戰國七雄幾乎全部都曾進行內部改革，但只有秦國成功地克服權力平衡機制、擴張成本上揚、地理障礙與鞏固擴張成果等挑戰，透過「自強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結合各個擊破策略，取得一統天下的果實（Hui, 2005: 54-108），成就超越無政府亂世，重塑政治體系秩序的目標。

伍、結論

現有主流國際關係典範的無政府假設，顯然不足以處理複雜的國際體系反覆變遷課題。衍生於無政府假設的主流國際關係典範，沒有留意到國際無政府結構的假設，只能適用於無政府靜態制約下的行爲體互動，拙於解釋政治體系由層級體系趨向無政府化的動態變化，也不能說明無政府狀態被能動者推向層級體系的結構變遷原因。先秦時代跨越五百年，先秦的國際體系亦歷經從鬆散層級體系、無政府多極國際體系，無政府單極體系，以及國際體系更易爲中央集權帝國的不同階段。運用這些解析有限的無政府結構假設，觀照豐富的先秦時代國際互動，不無有削足適履之嫌。

有別於只求適應於自然狀態生存競爭的現代美歐主流國關典範主張，華夏文明在先秦時代所發展的秩序取向政治思潮，值得吾人投注更多的關切。回顧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流派，在涉及政治體系本質的問題上，主流的儒家、墨家與法家都享有崇尚層級秩序治理，批判無政府亂世的共同基礎。先秦儒、墨與法家學說認爲，他們所面對的政治體系特質，是一個已經脫離自然狀態之層級體系再走向無政府化的亂世，於是無政府狀態不具有永續性，層級體系亦不無被無政府肆虐之可能。先秦國際體系的實踐，扭轉霍布斯以爲眾人授權於一人或是一公會（assembly），創建「利維坦」以禦外侮而定內爭的觀點（Hobbes, 1991: 120），反映體系能動者同時克服

[32] 商鞅指出，「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商鞅，198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部與外在環境之無政府挑戰，以權力優勢追求秩序的執著。先秦時代主流政治思潮與國家領導群體，並不鼓勵苟安於無政府亂世的有限目標，而企圖建立定於一尊的中央權威。能動者對於秩序的執著，成爲對內建立帝王權威專制政治體制，對外爭取國際體系內之主宰地位的重要動因。

擺盪於無政府狀態與層級狀態之間，國家行爲者同時面對內部與外部環境失序混亂的潛在威脅。爲克服內部失序無政府化挑戰，國家有組建國家機器走向一致化（unitary）的壓力；爲解脫外部國際環境的無政府亂世生存壓力，國家只有力爭成爲國際體系的權力暨權威雙重優勢主宰地位，營建以自我爲核心定於一尊的國際秩序，方能同時滿足低階的生存偏好，以及高階的尊榮偏好。先秦的國際政治實踐顯示，國際體系是一個已經脫離自然狀態，存留諸多先期實踐遺緒的物質－制度－觀念複合體。在秩序取向思想勝出的先秦國際體系中，國家的共享偏好是成爲體系主宰者，而非在國際體系內掙扎求生的最低訴求。

有別於美歐主流國際關係典範的推演，先秦政治思想強調政治秩序的重要，以及主宰者由上而下組建政治秩序的歷程。霍布斯以爲只有在眾人以契約型式交付其權利後，才能組建利維坦（Hobbes, 1991: 120-121）。但是先秦政治思潮以爲，只有依靠政治群體中的主宰領袖，才能夠脫離無政府亂世，組建政治秩序。《商君書》更以爲，自然狀態會產生行爲體渴求領導者組建秩序的結構作用（商鞅，1989：14-15），進而成爲各國強化內部治理效能，對外爭取國際社會主宰地位的論述基礎。依據先秦政治思想，自然狀態結構會促使行爲者追求秩序，解決內部與外部失序的混亂局面，建立內部權威優勢，進而追求外部國際環境的權力優勢主宰地位，營建以統治者爲核心的理想性天下秩序。所以，先秦政治思想似乎以爲，無政府狀態會促使國家受到追求秩序的結構驅動，追求權力優勢與組建層級治理體系。

先秦時代稱雄爭霸的故事是吾人所熟知的史實，卻也是自許投身國際政治研究的吾輩，感到陌生的一個國際體系。面對上下跨越三千年的中華國際體系，如何體會華夏民族超越無政府自然狀態的看法，從華夏社群重視秩序組建以超越無政府亂局的論點出發，開拓國際關係理論典範新局，是一個值得吾輩投注更多心力鑽研的新方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孔丘著，何晏集解，1998，《論語》，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諸子集成新編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1-95。

王日華，2009，〈道義觀念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以春秋戰國時期爲例〉，《國際觀察》，1: 54-60。

王先愼，2002，《韓非子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 972 冊）。

王存剛、劉　涵，2013，〈朝貢體系下古代東亞秩序形成與維繫的內在邏輯－批判地借鑒英國學派的分析方法〉，《國際安全研究》，4: 145-155。

司馬遷，2002，《史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 262 冊）。

老聃著，河上公注，1998，《老子道德經》，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諸子集成新編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361-383。

余　麗，2010，〈先秦中原文化區域國際政治思想主幹及其當代價值〉，《世界經濟與政治》，2: 01-118。

吳征宇，2008，〈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與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選讀評析〉，《當代亞太》，6: 134-142。

邢義田，1987，《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周方銀，2010，〈鬆散等級體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時期「尊王」爭霸策略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6: 4-34+156。

周方銀、高程主編，2012，《東亞秩序：觀念、制度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孟軻著，趙岐注，1998，《孟子》，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諸子集成新編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3-126。

書宗友，2005，〈霸權陰影下的戰略選擇〉，《國際政治科學》，4: 52-81。

荀　況，1989，《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商　鞅，1989，《商君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其賢，2009，〈「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7: 169-125。

張德勝，1989，《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張雙志，2006，〈論中華的起源與涵意〉，《黑龍江民族叢刊》，92: 59-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倬雲，1984，《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陳玉聃，2008，〈國際關係學中的經典與闡釋〉，《國際政治科學》，15: 102-114。
馮友蘭，2014，《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楊倩如，2009，〈對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的思考－兼評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的異同及其啓示〉，《國際政治科學》，19: 140-149。
楊倩如，2010，〈先秦國際體系的類型與演變〉，《國際政治科學》，21: 96-111。
楊　寬，1997，《戰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楊　寬，2002，《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葛兆光，1998，《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葛兆光，2014，《何爲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趙鼎新著，夏江旗譯，2006，《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墨　翟，1989，《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蕭公權，1982，《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
閻學通、徐進編，2009，《王霸天下思想及啓迪》，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Axelrod, Robert.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Axelrod, Robert and Robert O. Keohane. 1985.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1): 226-254.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liberi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ed. David A. Baldw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25.
Beitz, Charles R. 1979.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cher, David. 1998. *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n, Gerald. 1999. “The Origi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 Warring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Issues & Studies* 35(1): 147-166.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Press.
Glaser, Charles L. 1996.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Security Studies* 5(3): 122-166.
Glaser, Charles L. and Chaim Kaufmann. 1998.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4): 44-82.
Greenhill, Brian. 2008.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2): 343-368.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85-507.
Heller, Mark A. 1980. “The Use and Abuse of Hobbes: The State of Na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y* 13(1): 21-32.
Hobbes, Thomas. 1991. *Leviath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i, Victoria Tin-bor. 2007. “The Triumph of Domin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eds. Stuart J.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New York: Palgrave, 122-147.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2. “What (If Anything) 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 53-78.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Kang, David C. 2003/2004.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 165-80.
Kang, David C.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eley, James F. 2007. “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2): 417-430.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and Lisa L. Martin.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39-51.
Kugler, Jacek and A. F. K. Organski. 1989.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 Manus I. Midlarsky. Boston: Unwin Hyman, 171-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ke, David A. 200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ke, David A. 2007.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1): 47-79.

Layne, Charles.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4): 5-51.

Levy, Jack S. 1984.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2): 219-238.

Locke, John. 1991.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ilner, Helen. 1991.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1): 67-85.

Navari, Cornelia. 1982. "Hobbes and the 'Hobbes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3): 203-222.

Oye, Kenneth A. 1985.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38(1): 1-24.

Paul, T. V. and John R. Hall. 1999.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Ruggie, John Gerard. 1983.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5(2): 261-285.

Schwartz, Benjamin I. 1985.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3): 90-121.

Shannon, Vaughn P. 2005. "Wendt's Viol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Project: Agency and Why a World State is *No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4): 581-587.

Stein, Arthur. 1983.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Stephen D. Kras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15-171.

Stein, Arthur A. 1990.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2/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 128-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 Wesley.

Waltz, Kenneth.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391-425.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lexander. 2003.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4): 491-542.

Wendt, Alexander. 2004.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2): 289-316.

Williams, Michael C. 2011. "Recasting the Hobbesian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fter Hobbes,* eds. Raia Prokhovnik and Gabriella Slom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47-1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eyond Anarchy:
Order-Oriented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Pre-Qin Era and Their Inspir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

*Hsin-chih Chen***

Abstract

Assuming an 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 from the West argued that international actors could only accommodate to this anarchical structure with power struggles for survival. However,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pre-Qin era encouraged states to seek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stead and to construct a corresponding hierarchical order.

This essay hopes to go beyond the existing assumption held by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 and tries to explore new approaches with order-orientated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pre-Qin era. It also tries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the pre-Qin era compete for the dominant position. Major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s pre-Qin era assum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aturally pushes actors to seek hierarchical order so to manage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orders. States will look for power domination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 a world order with the dominating state at its core.

Keywords: Anarchy, Hierarchy, Dominate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Pre-Qin Era

---

* DOI:10.6166/TJPS.63(129-164)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paristor@mail.nck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